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 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①

[文章编号]1001-5558(2005)02-0038-12

●何启龙

[摘要] 本文考察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的蒙文佛经所使用的字母、译音和文章格式,判定它们源自蒙元时代。

[关键词]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蒙文佛经;蒙元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简介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Xarbuxyn Balgas)古城位于蒙古国乌兰巴托以西240里。1970年,苏联及蒙古国考古队伍在该古城的一个废弃佛塔中,找到了1000份桦树皮蒙古文手稿。这些桦皮手稿都是曾被使用的书籍,并作为献祭而埋藏在佛塔的墙壁泥土之中。

① 本文是笔者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攻读硕士学位(MPhil),收集毕业论文资料之时,分枝出来的研究题目。感谢我在科大的导师吕宗力老师,他为此文给予版本考证的意见。感谢科大黄敏浩老师给予的佛学提示。十分感谢科大的博士生刘宇光先生,他给我介绍了很多藏传佛教的观念。衷心感谢甘德星老师,他不但是我内陆亚细亚历史的启蒙老师,更为本文的藏文翻译给予极大帮助与指引。本文早在2003年12月完成,之后略有修改增补。感谢南京大学刘迎胜老师为文章的修改提供了指引与意见。

西北民族研究

N. W.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5年第2期(总第45期)

2005. No. 2(Total No. 45)

当中大部分文件到了 2000 年才被德国学者伊丽莎白·乔度 (Elisabetta Chiodo) 整理发表。^①

这些文件大部分都是佛教的经典及义理的概括、批注, 绝少完整的佛教经论。其余的文稿是关于佛教的礼颂诗歌、超度文章, 甚至占卜。据伊丽莎白的推论, 绝大部分文件属于 17 世纪上半叶。^②

文稿的来源

中国学者也认为这些文稿大约写于 17 世纪初。^③ 然而以我的观察, 这些文稿有两个来源: 其一是元朝 (1260~1368), 另一个就是 16 世纪中叶后在蒙古兴起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dGe-lugs-pa, 即黄教, 其领袖被称为达赖喇嘛)。

16 世纪下半期藏传佛教再兴对蒙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文稿中有只属于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颂》(文稿编号 XBM 74~XBM 77) 及《班禅与达赖之颂》(XBM 78)。宗喀巴 (Tson-kha-pa, 1357~1419) 是格鲁派的始创人, 而格鲁派是得到强大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 (阿勒坦汗 Altan Qan, 1507~1582) 支持后才开始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 甚至格鲁派的领袖“达赖”(Dalai) 之名也是俺答汗给予的。在俺答汗支持下, 兴起了佛教经典的翻译潮。新的文章结构、题跋、专有佛教名词、梵文藏文翻译等等皆被引入, 完全深受藏传佛教规范的影响。^④

然而, 相对来说, 要证明文稿中有部分源自元朝年代, 困难得多。在此, 笔者会尝试使用字母、译音、文章格式等等来考证这些桦树皮文稿, 找出元代起源之证明。

(一) 音写与转写

音写 (transliteration), 是把外来名词的发音翻译、转写 (transcription), 是把外来名词的字母一个个翻译出来, 并不理会当中的字母是否有发音意义。从 13 世纪元代开始, 佛教经典已开始被译为蒙古文, 但直到俺答汗大力鼓吹佛教之后, 藏传佛教经文才被大量地翻译为蒙古文。同时, 为了表达纯正的宗教虔诚, 译者对大量梵文藏文的佛教名词都采取了转写方式, 把梵文或藏文字母一一对应地转写为蒙古文。因此, 为了填补回鹘式蒙古

① 伊丽莎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② 伊丽莎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1.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③ 乔吉, 乌力吉. 关于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J]. 蒙古学信息, 2001, (3): 19.

④ [德] 海西希著. 耿升译. 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M]. (Walther Heissig, *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378.

何启龙·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字母之不足，译者创造了一系列特殊字母以翻译梵文藏文。这种字母叫做阿俐伽俐 (*ali-gali*)。^① 我们未能知道阿俐伽俐字母的详尽情况，只知这套字母自从 16 世纪末之后逐渐成为翻译的必用字母。因此，蒙文文稿中阿俐伽俐字母存在与否，就隐然成了该文件是源自 17 世纪初之前还是之后的分界线。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的桦树皮文稿也可分为两类：一类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另一类则没有。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喇嘛” (*lama*) 这个词。只有藏传佛教才存在“喇嘛”这个概念。喇嘛简单解作“师父”，汉译“上师”。藏传佛教属于佛教的密宗，独有秘密的方法帮助人得道解脱。而密法绝不会写于书本，只能由喇嘛向徒弟口传。西藏文“喇嘛”一字藏文拼写成 *bla-ma*，但发音时只是 *la-ma*，省略了辅音 *b*。当蒙古人在 13 世纪接受藏传佛教并翻译藏密经典之时，将藏文 *bla-ma* 音译成 *lama*。1904 年吐鲁番出土的元代蒙古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 (*Mañjuñrśnāmasamgīti*) 就是使用了 *lama* 这个音译。^② 自从 16 世纪末创造了 *bl-* 的阿俐伽俐字母，蒙文佛经之中“喇嘛”一字就渐渐被改译为 *blama*。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部分使用 *la-ma*，另一部分使用 *bla-ma*。^③

另一个例子就是藏传佛教之中观世音菩萨 (*Bodhisattva Avalokiteśvara*) 的咒语 (*dhāraṇī* 陀罗尼) 六字真言：*om ma ni pad me hūm* 嗡嘛呢叭咪吽。桦树皮文稿对这个咒语同样拥有两套翻译。第一套是 ཨོཾ་མ་ཎི་པད་མེ་ཧཱུཾ་ (oom mani bad mi qung)，^④ 第

① 阿俐伽俐 (*ali-gali*) 字母的创始人是阿尤什国师 (*Ayusi Güüsi*)。阿尤什得到俺答汗的支持，致力翻译佛教经典，被三世达赖赐与“国师”之称。详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 [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444，注 12。

② 达兰泰·策仁索诺姆，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特藏中的蒙古文文献 [M]。柏林：柏林科学出版社，1993.106。 (*Dalantai Cerensodnom and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pa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编号 Nr. 25r17。

③ 伊丽莎白·乔度上引书，“*lama*”见：XBM29 (2r: 9, 页 72), XBM30 (2v: 1, 页 75), XBM41 (4v: 6, 页 91), XBM78 (1v: 7, 页 173; 2r: 4, 页 174), XBM100 (1v: 1, 页 217), XBM101 (1v: 5, 页 220)。

“*blama*”见：XBM22 (1v: 2, 页 55), XBM23 (1v: 2, 页 63), XBM26 (11r: 1, 页 64), XBM66 (6r: 7, 页 152), XBM75 (1v: 12, 页 170), XBM106 (4v: 5, 页 226)

④ 伊丽莎白·乔度。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第一部分，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XBM29 (1v: 7, 页 72), XBM47 (2r: 10, 页 109), XBM60 (3v: 9, 页 135), XBM110 (3v: 5~6, 页 249)。

二套是 $\text{om mani bad me hum}$ (om mani bad me hum)。① 第二套翻译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h-”。所以，我们也可以假定，拥有第一种咒语翻译的文稿起源早于17世纪，而第二种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的咒语翻译大约起源于17世纪或之后。

(二) 菩萨 Bodhisattva 的译名

桦树皮文稿中，菩萨 (Bodhisattva) 一词出现了两种翻译，出现最多的一种译名是 bodisung 。② 然而，这可能是一种误写，其正确写法应是14世纪《入菩提行论》(Bodhicaryāvatāra) 的译名 bodistva 。③ 这个14世纪蒙古文的译词 bodistva 极贴近梵文 Bodhisattva，反而 bodisung 这个蒙文的发音既不像梵文，又不像汉语“菩萨”。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看出， bodistva 及 bodisung 两个蒙文字符串的外形极为相像。若我们将两个词语拆成字母，就能明白两词之不同： bodistva 的组合是 bodi-s-t-v-a ，而 bodisung 的组合却是 bodi-s-u-n-g 。很有可能，有曲牙的 v “-v-” 被意外地写成直线，况且“-v-”在蒙古文中并不常见，最终误写变成了习惯。16世纪下半叶以后，这个译名被规范成 bodisatv-a 。④

①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o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22 (6r: 6, 页 62), XBM75 (9r: 2~3, 页 171)。

②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o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25 (1v: 1, 页 64), XBM47 (2v: 9, 12, 页 110), XBM60 (3r: 5, 页 135), XBM110 (1v: 5, 页 246)。

③ 柯立甫. 1312年搆思吉·月即儿的“入菩提行论疏” [J].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第17卷1至2号 (Francis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Cosgi Odsi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7, No. 1/2), 页 57 的蒙古文索引。柯立甫所引的《入菩提行论》残本, 是德国学者于1903年在吐鲁番发掘的。

又见: 达兰泰·策仁索诺姆 (Dalantai Cerensodnom)、曼弗雷德·陶贝 (Manfred Taube) 上引书, 页 75~95 (Nr. 10~Nr. 21)。

④ 比如, 嵩祝寺的僧人“大喇嘛” (da-blama) 在1748年重译的《入菩提行论》。见 *Bodhicaryāvatāra Çāntideva*, 《佛学文库》28 (Bibliotheca Buddhica XXVIII), 弗·雅·符拉季米尔索夫 (B. Ya. VLADIMIRCOV,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编, 1929年; 《入菩提行论》, 《佛学文库》28,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165. 第十章: 34段第2行, 36段第2行。

何启龙·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文稿中的另一种“菩萨”翻译是འབྲུག་ སུབ་པུ་ (bovadi satuva)。^① 这个译词看来是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才出现的。^② 最后此译名被进一步规范为འབྲུག་ སུབ་པུ་ (bovadi satv-a), 也是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 “h-”。^{③④}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相信, 那些使用 bodistva 或 bodisung 菩萨译名的文稿, 有一个更古老的来源。

以上两项论证, 只能证明部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的起源要早于 16 世纪下半叶蒙古佛教再兴之时, 但这仍不足以证明这部分文稿源于 14 世纪的元代。因此, 以下笔者会考证文稿的书写格式以作证明。

(三) 皈依佛教愿文

佛教的皈依愿文是信徒表达自己对佛教虔诚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佛教文献, 如梵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汉文、回鹘文、藏文或蒙古文文献, 同样流行皈依愿文。皈依愿文的重心是三皈依(梵文 *tri-sarana*) 或三宝(梵文 *tri-ratna*): 佛、法(*dharma* 佛法)、僧(*sangha* 僧团)。^⑤ 三宝佛、法、僧代表了整体佛教, 向三宝发愿皈依就代表了对佛教的虔诚, 因此, 三宝佛、法、僧时常出现在皈依愿文之中。

藏传佛教的皈依愿文是很特别的, 属于密宗特色。他们除了皈依三宝之外, 更会向师父(藏文 *lama*, 梵文 *guru*, 汉文 上师) 表达同样的敬意。藏传佛教认为上师及上师整个师承派别, 都是佛理与密咒同样了得, 甚至认为上师祖师有菩萨一样的证果。因此, 藏传

①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28 (7r: 4, 页 70; 7v: 7, 页 70; 9v: 3, 页 70), XBM62 (1r: 3, 页 137).

② 伊丽沙白·乔度曾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 XBM28 (7r: 4, 页 70) 与 1938 年布内蒙古奥伦苏木 (Olon Süme) 出土的 16 世纪至 17 世纪的文稿 OS IV/55~56 互相比较。两篇内容相同, 但“菩萨”一词的译名不同: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用了 *bovadi satuva*, 而奥伦苏木文稿用的就是误写体 *bodisung*。

伊丽沙白·乔度认为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成书于 17 世纪初, 略早于 16 世纪末的奥伦苏木文稿。我们可以相信,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的 XBM28 文稿受到了 16 世纪末新的佛经翻译规范影响, 而奥伦苏木文件则仍然未受熏陶。

③ 《入菩提行论》(1748AD), 《佛学文库》28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页 3 (题跋第 4 行)。

④ 牛汝极: 《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 《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320.)

⑤ 皮尔诺 (Georges-Jean Pinault). 论吐火罗语中佛教术语的翻译 [A]. (The Rendering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in Tocharian?) 敦煌吐鲁番研究 [C]. 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 1996. 13.)

佛教的愿文不但崇敬上师，更把上师的位置放于三宝佛、法、僧之前。^①甚至在抄写非密宗经典或非宗教文书之时，藏传佛教徒仍会在序文或正文前写上向上师表达崇敬的愿文^②或写上藏密的密宗咒语。^③

部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亦拥有这种藏传佛教形式的愿文，表示向上师及三宝皈依。比如 XBM 100 (1v: 1~4)^④：

lam-a-nar-tur mörgömü (上师们一向扣拜)：： burqan-tur mörgömü (佛一向扣拜)：： nom-tur mörgömü (法一向扣拜)：： bursang quvaray-tur mörgömü (僧团一向扣拜)：：

在 XBM 22 (1v: 2~4)，甚至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翻译 blam (上师)^⑤：

blam-a-tur itegemüi (上师一向信任)： burqan-tur itegemüi (佛一向信任)：

nom-tur itegemüi (法一向信任)： bursang quvaray-tur itegemüi (僧团一向信任)：

另一部分文稿写上传统的皈依愿文，敬礼三宝，但没有包括上师。^⑥以下引用文稿中

① 《菩萨忏罪文》(byang chub sems phi ltungb bçags bshugs-so)：

blama la skyabs su mČiñ(上师一向皈依) || sangs-rgyas la skyabs su mČiñ(释迦一向皈依) || chos la skyabs su mČiñ(法一向皈依) || dGe ħDun la skyabs su Čiñ(僧团一向皈依) || 收入：宗喀巴(1357~1419). 菩提正道菩萨戒论[M]. 台北：金刚乘学会，1981. 250.

②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b. 1434)：《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上卷第二章《书首礼赞及前言》，第一句：“祈愿吉祥！顶礼上师及依怙文殊菩萨！”作者甚至先敬礼上师，才轮到文殊菩萨 (Mañjuñri)。陈庆英译。汉藏史集 [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4.

③ 索南坚赞(1312~1375). 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 第一句：“唵嘛呢叭咪吽 顶礼大悲救主圣观自在菩萨。”

④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M]. 第一部分，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o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 22(4v: 6~9, 页 91), XBM 100(1v: 1~4, 页 217), XBM 101(1v: 5~9, 页 220)。

⑤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0. 55.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o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⑥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出版社，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o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 46 (1v: 1~3, 页 100), XBM 47 (1v: 1~6, 页 108), XBM 87 (1v: 1~2, 页 200), XBM 110 (1v: 1~3, 页 246)。

何启龙·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的《金光明经》“ ᠠᠯᠲᠠᠨ ᠭᠡᠷᠡᠯ ᠨᠠᠮ ” (altan genel nom) 心要:^①

$\text{ᠨᠠᠮᠪᠤ ᠪᠣᠠᠳᠠ ᠠᠨᠤ ᠨᠠᠮᠪᠤ ᠳᠠᠷᠮᠠ ᠠᠨᠤ ᠨᠠᠮᠪᠤ ᠰᠠᠨᠬᠠ ᠠᠨᠤ}$

NamB booda%) - NamB DaRma%) - NamB SaŃKa%) -

namo budday-a:; namo darmay-a:; namo sanggay-a:;

南无(敬礼)佛 南无法 南无僧(僧团)

这一类愿文直接翻译了梵文愿文。这种愿文翻译大概起源于回鹘佛教,^② 并一直用到回鹘佛教衰亡。^③ 至于蒙古的这—种愿文, 在 17 世纪后被规范地使用阿喇伽喇字母翻译。^④ 这一套愿文与藏传佛教惯用的愿文极不相同, 就算并非源于回鹘佛教, 也必定来自不同源头。

(四) 题跋结语——“善哉善哉”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件广泛地使用一对结语 ᠰᠠᠳᠤ ᠡᠳᠭᠦ (sadu edgü, 汉文译为“善

^①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 29 (1v: 1~3, 页 72), XBM 30 (1v: 1~2, 页 75)。

^② 据牛汝极说, 回鹘人用自己的文字拼写梵文的皈依愿文, 例如, 吐鲁番藏品文件 U 6170. 牛汝极: 《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327.)

据伊丽沙白·乔度 (Elisabetta Chiodo) 所说, 同样的发愿文亦存在于回鹘密宗文献。例如卡拉 (Kara)、齐默 (Zieme): 《回鹘文密宗译文残件》(*Fragmente tantrist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柏林 (Berlin), 1976 年, 页 40。

^③ 1910 年, 俄国学者马洛夫 (S. E. Malov) 在酒泉搜得了一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sottama Sūtra*)。这本回鹘文佛经抄写于“大清国康熙廿六年 (1761 年)”, 是现存最晚的回鹘文佛经。当中, 每一章的起初三句, 都是敬礼三宝的皈依愿文:

$\text{ᠨᠠᠮᠪᠤ ᠪᠣᠠᠳᠠ ᠠᠨᠤ ᠨᠠᠮᠪᠤ ᠳᠠᠷᠮᠠ ᠠᠨᠤ ᠨᠠᠮᠪᠤ ᠰᠠᠨᠬᠠ ᠠᠨᠤ}$

namo budday-a:; namo drmay-a:; namo sanggay-a:;

见: *Suvarnaprabhāsa* in *Bibliotheca Buddhica XVII*, edited by W. Radloff (B. B. Радловъ) and S. E. Malov (C. E. Маловъ), St. Petersburg, 1913~1917; 《金光明经》(*Suvarnaprabhāsa*) - 《佛学文库》17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页 2 (第一章, 1b: 1~3)。

^④ 《入菩提行论》(1748AD) - 《佛学文库》28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页 3 (序文第 1~3 行):

$\text{ᠨᠠᠮᠣᠪᠳᠬᠠ ᠪᠣᠳᠬᠠ ᠳᠠᠷᠮᠠ ᠳᠠᠷᠮᠠ ᠰᠠᠨᠭᠬᠠ ᠰᠠᠨᠭᠬᠠ}$

namova buddhaya; namova dharmaya; namova sangghaya;

哉善哉”)^①。这一个完结格式同样使用于内蒙古奥伦苏木 (Olom Süme) 出土的 16 世纪末佛教经文。^② 这对结语从 17 世纪开始衰落。德国学者海西希 (Walther Heissig) 汇编记录了丹麦收藏的八百多份 17 世纪至 20 世纪蒙古文文件。据他的记录, 当中只有两份佛教文件使用结语 sadu edgü, 同时那些文件都被认为起源较古老。^③ 这对结语应该在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之前就被放弃了。^④ 当结语 sadu edgü 开始衰落时, 密咒结语 mamghalam 开始渐渐流行。既然这个 mamghalam 结语使用了阿俐伽俐字母 “h”, 那么这个结语应是 16 世纪末才被引入蒙古佛教的。部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也使用了结语 mamghalam,^⑤ 丹麦所藏的蒙古文文献也大量地使用了结语 mamghalam。

①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 8 (5r: 10~11, 页 44), XBM 9 (6v: 13, 页 44), XBM 30 (5r: 4, 页 77), XBM 40 (9v: 7, 页 85), XBM 41 (5v: 6, 页 91), XBM 46 (5v: 1, 页 102), XBM 47 (4v: 5, 页 114), XBM 49 (9r: 11~12, 页 118), XBM 73 (4r: 6, 页 167), XBM 82 (5v: 10, 页 193), XBM 107 (8r: 9, 页 237), XBM 110 (9v: 11, 页 258)。

②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34.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③ 海西希、萨迦斯特: 《蒙古文抄本、雕版印本及地图》(Walther Heissig and Klaus Sagaster,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Wiesbaden, 1961), 页 128 Nr209; 页 134 Nr220。

④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 乾隆皇帝下旨汇编规范满汉蒙藏四种语文的密宗咒文, 最后编成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书中亦收了圣旨, 圣旨也是四种文字对照。汉文“善哉”与藏文 *legs-so* (好) 对译, 蒙古文则使用了日常用语 *sayin* (好) 对译。这也证明, 当时蒙古佛教的古老词汇 edgü 及 sadu 已经被放弃使用。

见:《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影印 1761 年本)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5。

⑤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x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XBM 4 (6r: 11, 页 41), XBM 19 (8~9, 页 52), XBM 21 (5r: 7, 页 53), XBM 22 (6r: 5, 页 62), XBM 41 (5v: 6, 页 91), XBM 73 (5r: 6, 页 168), XBM 75 (9r: 4, 页 171), XBM 106 (5v: 13, 页 228)。

何启龙·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显而易见，“善哉善哉” ᠰᠠᠳᠤ ᠠᠳᠦᠭᠦ (sadun edgü) 这个蒙古佛教的古老用语的起源必定早于 16 世纪。以下笔者就证明这个古老结语起源于元代 (1260 年~1368 年)。

ᠰᠠᠳᠤ (sadu) 及 ᠠᠳᠦᠭᠦ (edgü) 两字皆来自梵文 sadhu, 其意思是“好”。^① 这个梵文字 sadhu, 汉文译为“善哉”, 藏文则译成 legs-so。^② 在回鹘佛教经文中, 这个梵文就被译为 sadu 或 ädgü, 10 世纪的回鹘文佛教著作已经出现了 sadu ädgü 这对结语。^③ 13 世纪至 14 世纪, 回鹘佛教跟随元朝一同深受藏传佛教影响,^④ 大量藏文经典亦被翻译成回鹘文, 但回鹘佛教的传统结语仍然未被取代。^⑤ 直到回鹘佛教衰亡, 结语 sadu ädgü 仍被使用。^⑥

蒙古佛教的结语 ᠰᠠᠳᠤ ᠠᠳᠦᠭᠦ (sadu edgü) 应是借自回鹘佛教的结语 sadu ädgü。极少

① 伊丽沙白·乔度. 蒙古科学院所藏发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蒙古文桦树皮手写文稿 [M]. 第一部分, 威斯巴登: 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000. (Elisabetta Chiodo,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on Birch Bark from Xarbusyn Balga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art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44. 注 55.

梵文 sadhu > 古突厥文 sadu > 蒙古文 sadu

梵文 sadhu > 古突厥文 ädgü > 蒙古文 edgü

② 色拉特·衬特拉·戴斯: 《藏英字典》, 加尔各答: 孟加拉国文书课书馆, 1902 年 (Sarat Chandra Das,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ôt, 1902), 页 1219, legs-pa 解作“好”, legs-so 解作“很好”。

③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83~84.

1908 年, 德国学者在吐鲁番找到一份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学者都认为这版本被翻译于 10 世纪。该经文的题跋之最后一句就使用了 sadu ädgü。

④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55.

⑤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123~124.

1907 年, 斯坦因 (Stein) 在敦煌找到了一份回鹘文密宗经文《吉祥轮律仪》 (Sri-cakrasamvara), 该经文写于元朝至正十年 (1350)。此经有 63 张纸, 共 126 版。在 46a~46b 版, 写下了何时及为何抄写该经, 最后也就使用了结语 sadu ädgü; 46b 版的左上角写下了婆罗迷文 sadhu。16b 版出现了汉文结语“善哉善哉”; 58b 版, 也出现“善哉”及另一形式的汉文结语“娑土”, 此即梵文 sadhu 的汉语音译。

又,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8. 125~127.

德国柏林保存了数本出自吐鲁番的回鹘文密宗经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 (*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其中一本的题跋说明经文是 1302 年 (壬寅年) 迦鲁纳答思 (Qarunadaz) 所写 (他的事迹见于《元史》卷一三四《迦鲁纳答思传》), 题跋最后一句就是结语 sadu sadu。

⑥ 1761 年写成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 差不多每个章节的尾跋都使用了结语“善哉善哉”。例如, 第一章 18b 版, 其结语是 ᠰᠠᠳᠤ ᠠᠳᠦᠭᠦ ᠯᠢᠭᠰᠣ sadu ädgü ligso。第三个字 ligso 源自藏文 legs-so, 其意为“很好”。而且, 藏密咒语 Oom a qung 亦常常写在每章节前的序文中。这个版本的回鹘文佛经深受藏传佛教影响, 但仍然保存了回鹘佛教的传统结语 sadu ädgü。见:《金光明经》 (Suvarnaprabhāsa) —《佛学文库》17 (台北: 弥勒出版社, 1984), 页 34 (第 1 章 18b 版: 15~16); 页 35 (第 2 章 1a 版)。



元代的蒙古文佛经能流传至今。庆幸的是，吐鲁番出土了一张《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残页，当中刚好写了尾跋，该尾跋就使用了结语 *sadu sadu*。^① 虽然结语 *sadu sadu* 并不完全与结语 *sadu edgü* 相同，但两者同样也是解作“善哉善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结语 *sadu edgü* 是从元代（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开始，一直使用到 17 世纪初。

考虑以上四个论点，我相信，部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起源早于 16 世纪末的另一个系统，而该佛经系统可能起源于元代。这些文稿可能经过不断的抄写，从而把元代蒙古文佛经的内容与习惯保存下来。即是说，虽然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可能抄写于 16 世纪末或 17 世纪初，但保存了元代的古老内容。

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与历史背景

在此，我将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跟蒙古佛教作比较，这能确保推论没有违反历史事实。

蒙古人第一次大规模信奉佛教，始于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的萨迦教派 (Sa—Skya—pa)。虽然蒙古人相信的是藏传佛教，不是回鹘佛教，但由于蒙古人与回鹘人的文化及言语相近，蒙古文字更是借自回鹘文字，所以蒙古佛教深受回鹘佛教及回鹘僧侣的影响。^② 大量的回鹘佛教词语借进了蒙古佛教，比如：*ayay—qa tegimlig* “尊者”^③、*bursang quvaray* “僧团”^④、*burqan* “佛”。整个元代，蒙古人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入，他们并不

① 达兰泰·策仁索诺姆，曼弗雷德·陶贝上引书，页 112~113 (Nr. 28)。

由于这张经已残破，尾跋最后一句也出现残缺：「[...]:: *sadu*::」。由于回鹘文佛经也时常出现结语 *sadu sadu*，我们可以推断该残缺结语的完貌应是 *sadu sadu*。

也见：杨富学。回鹘之佛教 [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125~127。

② 杨富学。回鹘佛教对北方诸族的影响 [A]。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 [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17~20。

③ 牛汝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回鹘文三宝愿文研究 [A]。回体佛教文献 [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396，第 20 行。

柯立甫 (Francis W. Cleaves) 上引文，页 100，注 118。

ayay—qa tegimlig 这个名词也出现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 XBM 1 (1r: 12~13, 页 37~38)。

④ 牛汝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回鹘文三宝愿文研究 [A]。回体佛教文献 [C]。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395，第 04 行。

柯立甫上引文，页 101，注 125。

bursang quvaray 也见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 XBM 41 (4v: 8, 页 91), XBM 101 (1v: 8, 页 220)。

何启龙·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出土蒙文佛经之中的蒙元因素

认真理解佛教义理，却爱上了藏密的咒语及医术。^① 话虽如此，元朝被明朝驱逐后，佛教仍然从未于蒙古人中消失。^② 14世纪至16世纪之间，蒙古部落访问明朝的使节，很多也是佛教僧侣。这些僧侣时常向明朝要求赏赐经书及佛教礼器。^③ 明朝史书记录当时的蒙古人名字，都展示了极深的佛教色彩。^④ 同时，元代翻译的蒙古文佛教文献一直被保存。例如，元代名僧捌思吉·月即儿/捌思·斡节儿 (b. 1310) (藏文 *Čhos-kyi hod-zer' a*, 蒙文 *Čosgi Odsir*, 汉意 法光) 翻译的《入菩提行论》，有蒙元时代的经文残页出土，^⑤ 这译本更一直保存到清朝。^⑥ 另一例，《五守护神大乘经》(梵文 *Pañcarakṣā*, 蒙文 *tabun sakiyan*, 意即“五护”)的回鹘文版本，在元代被翻译成蒙古文，^⑦ 并一直保存到16世纪末。^⑧

① [德] 海西希著. 耿升译. 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M]. (Walther Heissig, *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373~374.

这也颇合乎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的类型，当中差不多没有佛经，只有极少量的教理要义，却有大量的圣诗、颂文、超度文、占卜书。

见: 乔吉、乌力吉. 关于德国出版的桦树皮蒙文文献 [J]. 蒙古学信息, 2001, (3): 17~18.

② 亨利·赛瑞 (Henry Serruys). 蒙古的早期喇嘛教 [J]. 远东, (Henry Serruys, *Early Lamaism in Mongolia*'), *Oriens Extremus*, 第10期 (1963年), 页181.

③ 亨利·赛瑞上引文, 页189~193.

④ 亨利·赛瑞上引文, 页197~201.

⑤ 柯立甫上引文, 页2~31.

⑥ 这个版本的《入菩提行论》是由嵩祝寺的僧侣“大喇嘛”编译于1748年。据题跋言，大喇嘛参考了各个版本的《入菩提行论》，当中包括元朝著名僧侣捌思吉·月即儿的译本。

参见柯立甫上引文, 页2~31.

⑦ 照那斯图、牛汝极. 蒙古文—八思巴字《五守护神大乘经·守护大千国土经》元代印本残片考释 [J]. 民族语文, 2000, (1): 38~42. 据称该残片出自西夏黑水城遗址。经文主要由回鹘式蒙古文写成，但当翻译陀罗尼经咒之时，回鹘式蒙文左边会以一行细小的八思巴字母标音，以确保密咒发音准确。

⑧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保存了一个出自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经文《五守护神大乘经》。当中的题跋描述了该经文前后的三个译本：第一个版本，是由元代名僧捌思吉·月即儿基于回鹘文版本翻译而成；第二个版本，是元末时对第一版本的校订；第三个版本，是1587年阿尤什国师 (*Ayusi Güüsi*) 使用阿俐伽俐字母重新翻译各种梵藏名称。

见: 帕特里克·汉拿: 《燕京珍藏》，美国麻省剑桥: 哈佛燕京图书馆 (Patrick Hanan,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of th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2003), 页116~117.

格鲁教派由于得到俺答汗的支持，于16世纪后半叶开始成为蒙古佛教的主流。但同时，直到16世纪末，外蒙古仍然流传着属于藏传佛教之红教的寺庙及宗教团体。红教，即是格鲁教派以外的所有藏传佛教派系，比如被元朝奉为正宗的萨迦教派（Sa-Skya-pa）。^①

我估计，出土于蒙古国哈勒不浑—巴勒哈孙古城的佛经有相当一部分是承袭于蒙元时代。这个推断看来也合乎史实：直到16世纪末，元代翻译的佛教文献及元代流行的教派仍然流传着。

附注：

由于笔者不熟悉藏传佛教的义理与经文，未能深入分析哈勒不浑—巴勒哈孙文稿中的佛教义理是否与元代萨迦教派的义理一致。如能从佛教的经文内容义理作比较，应该更能证明笔者的推论。同时，真正保存下来的元代的蒙古文佛教经文实在太少，因此未能作更详尽更深入的内容比较。

[收稿日期] 2004-12-04

[作者简介] 何启龙，南京大学蒙元史博士生。南京 210093

Mongolian and Yuan Factors in Buddhist Literatures Written in Mongolian Scripts Unearthed in Ancient City *He Qi-l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alphabets, transliterations and writing form of the Buddhism literatures in Mongolian scripts unearthed in ancient city and holds the idea that the Buddhism literatures emanate from Mongolian Yuan period.

Key words: Buddhism literatures in Mongolian scripts; Mongolian Yuan perio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unhuang Monastery and Country Estate in Central Plain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Wudai Time *Zhang Jiu-xian, Duan Xiao-qiang*

Abstract: Dunhuang w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ibet and Guiyi Army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Wudai. At the time the pattern of monastery was similar to that of country estate in Central Plains. By comparing them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the constitution of classes, economy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we know that Dunhuang monastery is the incomplete country estate.

Key words: Dunhuang monastery; country estate in Central Plains; compareson; research
(* P. 32)

① [德] 海西希著，耿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M]. (Walther Heissig, *Die Religionen Tibets und der Mongolei*),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377.